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被侮辱与损害的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霁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霁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

根据 Constance Garnett 英译本译出,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72 和 1956 年版校订

被侮辱与损害的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李霁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99,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40,001—80,000 册

ISBN7-5327-1923-5/I·1154
定价：9.00 元

第一部

第一章

去年三月二十二日黄昏时分，我碰到一件很奇怪的事。那一整天我都在城里四处奔走，想找一个住处。我的旧住处很阴湿，我的咳嗽又开始恶化了。秋天里我就有意搬家，但却拖延到春天。一整天我都没有找到一所过得去的住房。首先，我要找一处单独的寓所，而不要别人寓所中的一间房子；其次，即使只有一个房间，但必须是个大房间，当然房租要尽可能便宜些。我发觉，住在狭窄的寓所里，就连思路也会变得狭隘的。我在构思未来的小说时，总喜欢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顺便说说，我总觉得构思一部作品，想象着它们完成以后是个什么样子，这比坐下来写作是更为快意的事。这实在并不是因为懒。那是为什么呢？

我一早就觉得不舒服，到太阳西下时就觉得很难过了。我好像在发发热病。而且我又奔跑了一天，很疲倦。傍晚天未黑之前，我正顺着沃兹涅先斯基大街行走。我爱彼得堡三月的太阳，尤其是黄昏时的夕阳，当然天气要晴朗、寒冷。在这种情况下，整条大街突然亮得耀眼，沐浴在明亮的光线里。所有的屋子似乎都突然明亮起来。它们那灰色、黄色和浊绿色顿时失去了全部暗淡的色彩，你的心中仿佛突然开朗起来，你仿佛吃了一惊，或者有人用臂肘轻轻碰了你一下，使你产生一种新的见解，一连串新的思想……一线阳光能对人的心灵发生这样影响，真叫人惊奇！

但是阳光消失了；严寒加剧，开始刺痛人的鼻子；暮色加深，煤汽灯从店铺里放出光来。当我走到米勒糕点糖果店的时候，我突然站住脚，并向街那面定睛凝视，仿佛预感到我就要遇到一件不平常的事。就在那一瞬间，在街那边，我看到一个老人和他的狗。我还分明记得，有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使我的心紧缩起来，我自己也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不是一个神秘论者。我不大相信预感和占卜，然而在我的生活中却发生过一些无法索解的事情，或许好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例如这个老人：为什么我一遇到他，立刻就预感到当晚会碰上一件不太平常的事呢？不过我正在病中，而病中的感觉几乎总是虚幻的。

老人伛偻着身子，用手杖轻敲着人行道的石板，两腿仿佛棍子一般不弯曲，用缓慢无力的步子向果点店走去。我生平不曾遇见过这样奇这样不可理解的人；以前无论什么时候在米勒的店门口遇见他，他总感到痛苦和吃惊。他那高大的身材，他那伛偻的背，他那八十岁老人的死气沉沉的脸，他那连衣缝都破裂了的旧大衣，他那至少戴了二十年的破圆帽（他的头秃光了，只在后脑勺上留下一撮已经不是银白色，而是白里透黄的头发，用破帽盖着）；他的一切动作似乎并无目的，仿佛是由上紧的发条发动的——第一次遇见他的人，都难免为这一切感到震惊。看见一个孤苦伶仃、无人照顾、衰老不堪的老人，尤其因为他像一个逃开看守者的疯子，实在令人纳罕。他瘦骨嶙峋，似乎除了一张皮包着骨头之外并没有肌肉，这也使我感到惊讶。他那双毫无神采的大眼睛，仿佛安放在发青的眼眶里，总是笔直地望着前方，从来不朝别处看，也不可能看见什么东西——我保证是这样；虽然他看着你，他却笔直地向你走来，仿佛他前面是一片空旷地带。这情形我注意到几次了。他近来才在米勒的店里出现，身边总是跟着一条狗，谁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米勒店里的主顾没有一个人敢冒然招呼他，他也不和任何人说话。

“他为什么要拖着艰难的步履到米勒店里来呢？他到那里有什么事呢？”我在街那边默默站着，不由自主地凝视着他，暗暗琢磨着。我心里觉得烦恼，是病与疲倦使我产生这种情绪。“他在想些什么呢？”我继续暗自揣测。“他脑子里在转些什么念头呢？不过他还能想些什么吗？他的脸是这样死气沉沉，一点表情也没有。这条讨厌的狗从不离开他一步，仿佛是他身上分不开的一部分，和他是那么相像，他是从什么地方把它弄来的呢？”

这条可怜的狗看来也有八十来岁了，是的，一定有这么老了。第一，它看来比所有其他的狗都老；其次，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它时，就觉得它和别的狗不一样，它不是一条寻常的狗；它身上一定有一种神奇、怪异的魔力，它也许是以前以狗的形状出现的梅菲斯特^①吧；它的命运也许以某种

^① 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第一次在浮士德面前出现时，现形为一条狮子狗。

神秘莫测的方式和它主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看着它，你会立刻想到，它吃过最后一顿饭到现在一定有二十来年了。它瘦得像一具骷髅，或者说像它的主人，这二者本来就相差无几。它身上的毛几乎落光了，尾巴也光秃秃的，像一根棍子，紧紧地夹着。它那长着长耳朵的头有气无力地耷拉着。我生平从未遇见过这样讨厌的狗。当他们一同沿街行走的时候，主人~~身前~~，狗跟在后面，它的鼻子碰到他的衣服下摆，仿佛连在上面似的。他们的步态和整个外貌仿佛每走一步都在高声叫出：

“我们老了，老了。主啊，我们是多么老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还想到，这个老人和这条狗是从加瓦尼作插图的霍夫曼小说中走出来的^①，他们正在为本书作活动广告，到街上来表演。我过了马路，跟着老人走进果点店。

在铺子里，老人表现得很古怪。近来，米勒站在柜台后面，一看见这位不速之客进了门，便要做出不高兴的鬼脸。第一，这个奇怪的顾客从来不买什么东西。每次他都笔直地走向放着炉子的角落，在炉旁一张椅子上坐下。假如他那个靠炉子的座位有人坐着，他就茫然不知所措地在占了他位置的先生面前站一会儿，然后为难地走开，到窗边的另一角落去。在那里他就选定一张椅子，慢吞吞地坐下，摘下帽子，放在地板上，把手杖放在帽子旁边，于是向后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坐上三四个钟头。他从来不拿起一份报纸，从来不说一句话，也不吭一声，只是坐在那里，睁大眼睛笔直望着前面，但是目光是那么迟钝，毫无生气，人们满可以打赌，他对于周围的事，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狗在同一地方转了两三圈之后，就把鼻子伸到他那双靴子中间，闷闷不乐地在他脚前躺下，深深地叹着气，并在地板上伸开身子，也是一动不动地待一整个晚上，仿佛暂时死去一样。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生物终日在什么地方死一般躺着，到了日落时才突然复活，只是要拜访米勒的果点店，来履行什么神秘的、别人都不知道的责任。坐了三四个钟头之后，老人终于站起来，拿起帽子，动身向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家里走去。狗也爬起来，又照样夹着尾巴垂着头，用同样缓慢的步子，机械地跟着他。铺子里的主顾们终于想方设法回避这个老人，甚至不愿意

① 保尔·加瓦尼(1804—1866)，法国著名画家，因作小说插图而得名。霍夫曼(1776—1822)，德国小说家，他的《霍夫曼幻想小说》于一八四六年译成法文，由加瓦尼作插图，在巴黎出版。

坐在他旁边，仿佛对他极其厌恶。而他对此却毫无觉察。

这个果点店的顾客多半是德国人。他们是从整条沃兹涅先斯基大街聚集到这里来的，多半是各种作坊的老板：其中有铜匠、面包师、染坊主、帽店老板、马鞍师傅；就德文意义上讲，这都是些老派的人。米勒家还保存着古老的传统。店主时常走到他所熟识的顾客跟前，和他们围着桌子坐下，喝点五味酒。家里的狗和小孩子有时也到顾客身边玩玩，顾客们则对孩子们和狗表示表示抚爱。他们彼此熟悉，相互尊重。当顾客们专心地阅读德国报纸的时候，从店主住房里传来一阵奥古斯汀^①的乐曲声，这是店主的长女在丁丁当当地弹奏钢琴。她是个长着淡黄鬈发的德国小姑娘，很像一只白老鼠。这首华尔兹舞曲很受欢迎。我每月初都到米勒店里去，读那里所订的几种俄国杂志。

我走进果点店时，看见老人已经坐在靠窗子的地方，狗和往常一样伸直身子躺在他的脚前。我不声不响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并在心里自问：“我在这里实在无事可做，我又病了，不如赶紧回家喝茶睡觉，这时候，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呢？难道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看看这个老人吗？”我恼火了。“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边想边回忆着刚才在街上看着他时所怀的那种奇异的、痛苦的感觉。“这些呆头呆脑的德国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产生这种古怪的心情有什么意思呢？我近来才在我自己身上发现，琐事引起的毫无必要的激动正在阻碍我生活，阻碍我清楚地看待人生，这种激动有什么意思呢？一位很有眼光的批评家，在气愤地批评我最近一部小说时，已经向我指出这一点了。”我虽然迟疑、感慨，却仍然待着没走，同时疾病也愈加厉害地折磨着我，使我舍不得离开这个温暖的屋子。我拿起一张法兰克福报纸^②，读了两行，便打起盹来了。那些德国人并没有打扰我。他们一面看报，一面吸烟，只是每隔半个钟头左右断断续续低声彼此交谈一点法兰克福的新闻，或德国著名幽默作家沙菲尔^③的俏皮话。接着，便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又埋头阅读起来了。

我打了半点钟盹，猛烈的寒颤使我醒了过来。实在该回家了。但是这时屋里发生了一场哑剧，使我留了下来。我已经说过，老人一在椅子上坐

① 指《我亲爱的奥古斯汀》，德国流行的圆舞曲。

② 似指一八五六年创刊的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德文日报。

③ 沙菲尔(1795—1858)，德国幽默作家。

下，就把眼睛盯着一个目标，整个晚上就不再转眼看别的地方。这种固执得不可思议的、视而不见的目光，过去也偶然选中我作为对象。这是一种极不愉快的、实在令人受不了的感觉，我通常是尽快换个座位。这个时候，老人的牺牲者是一个矮小圆胖、衣冠楚楚的德国人，他那竖起的衣领浆得又挺又硬，脸色极其红润，他是这家铺子的新客，一个从里加来的商人。我后来听说，他名叫亚当·伊凡尼奇·舒尔茨。他是米勒家的密友，但是还不认识这个老人和许多顾客。他喝着五味酒，很有兴致地读着《农村理发师报》^①，突然抬起头来，看见老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使他感到很难堪。亚当·伊凡尼奇是个很容易生气而且很敏感的人，像所有“高贵”的德国人一样。他被人这样无礼地死盯着，感到又奇怪又屈辱。他强压着愤怒，转过眼睛，不去看这个不知趣的客人，暗自嘀咕着，用报纸把自己遮起来。但是，他忍不住，过了一两分钟，他又从报纸后面狐疑地向外看了看：仍然是同样固执的目光，仍然是同样无意义的审视。这一次，亚当·伊凡尼奇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当他第三次发现同样的情况以后，便发起火来，并认为他有责任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在这些高贵的公众面前败坏美好的里加城的声誉——或许他自以为是那个城市的代表吧。他不耐烦地把报纸扔到桌上，用报夹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他由于个人尊严受到损害而勃然大怒，由于喝了五味酒和激起自尊心而满面通红，现在轮到他用充血的小眼睛盯住那冒犯他的老人了。看来这个德国人和他的对手都在用凝视的催眠术彼此斗法，等着看谁先觉得难为情，低下眼睛来。报夹的敲击声和亚当·伊凡尼奇的古怪姿态引起了所有顾客的注意。他们都立刻把事情放在一旁，怀着好奇心，一本正经地默默地观看着两个对手。这场面变得很滑稽，但是面红耳赤的德国人那挑战的小眼睛的催眠术完全不起作用。老人不动声色，仍然直直地凝视着狂怒的舒尔茨先生，他根本没有发觉自己成了大家注意的对象，仿佛他不是生活在地上，而是生活在月亮上。亚当·伊凡尼奇终于按捺不住，发作起来了。

“您为什么这样死盯着我？”他以尖厉的声音，带着威胁的神气，用德语叫道。

但是他的对手仍然沉默着，仿佛并不明白，甚至没有听到他的问话。

^① 一八四四年起，在莱比锡出版一种幽默杂志，称《农村理发师》；从一八五二年起，改为《农村理发师报》。

亚当·伊凡尼奇决定和他说俄国话。

“我问你为什么的你把我这样看着的？”他倍加愤怒地叫道。“我在宫廷都很知道的，你在宫廷可不知道！”^①他霍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又加上一句。

但是老人纹丝不动。那些德国人发出一片气愤的低语声。米勒听到喧闹声，走进屋子里来。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后，心想这老人也许是个聋子，于是俯身凑到他的耳边。

“舒尔茨先生请你不要盯着他，”他尽量提高声音说，同时注视着这莫名其妙的顾客。

老人机械地看了看米勒；他那原来死板板的脸上，这时露出激动不安的神色和慌乱的样子。他手忙脚乱，弯下身子，气喘吁吁地去拾帽子，把它和手杖一起抓住，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现出可怜的微笑——就像一个穷人误坐了别人的座位，被赶走时发出的那种充满屈辱的微笑，——准备走出去。这个可怜的衰弱的老人那样温顺，那样诚惶诚恐、慌慌张张，使人如此哀怜，如此心痛：因而从亚当·伊凡尼奇开始，所有的人都立刻对这件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显然，老人不仅不能侮辱任何人，他还时时意识到：他会像一个讨饭的一样，被人随时随地赶出去。

米勒是个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人。

“不用走，不用走，”他善意地拍着老人的肩膀，说，“还坐着吧。舒尔茨先生只是诚恳地请你不要死死看着他。他在宫廷里是个有名的人。”

但是这可怜的老人并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比原先更加慌张。他弯腰拾起从帽子里掉下来的破蓝手帕，并开始叫他的狗。狗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用两只前爪护住鼻子，似乎熟睡了。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用颤抖的衰老声音喃喃地叫它。“阿佐尔卡！”

阿佐尔卡没有动。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烦恼地反复叫着，并用手杖碰碰狗。但狗还是躺在原地不动。

手杖从他手里掉下去。他弯下身子，跪下去，用双手举起阿佐尔卡的头。可怜的阿佐尔卡！它死了。它无声无息地在主人的脚跟前死去了，或许

① 这里原书使用的是德国人说的不甚通顺的俄语。

是因为年老，或许也是因为饥饿。老人对着狗看了一会儿，仿佛感到吃惊，似乎不明白阿佐尔卡已经死去；于是他温存地向他的老人兼朋友弯下身子，把他苍白的面颊紧贴在死狗的脸上。沉默了一分钟。我们全受了感动……可怜的老人终于站起来。他脸色很苍白，全身像发热病似地颤抖着。

“你可以把它做成漂本（漂本就是标本）。”富有同情心的米勒说，他想多少安慰安慰老人。^①“你可以好好做成漂本，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盖尔做得顶好的；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盖尔是了好手，”米勒反复说。他从地上拾起手杖，把它递给老人。

“是的，我能做得好，”克里盖尔先生亲自走上前去，谦虚地接过话头说。他是个瘦长而有德行的德国人，长着一绺一绺的红头发，鹰钩鼻子上戴着眼镜。

“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盖尔在各种美丽漂本上有大天才，”米勒补充说，他为自己想出这样的办法而高兴起来。

“是的，我在各种美丽的漂本上有大天才，”克里盖尔先生又重说一遍。“而且我可以免费把你的狗做成漂本，”他表现出一种非常慷慨的自我牺牲精神说。

“不，我愿意付钱做这个漂本！”亚当·伊凡尼奇·舒尔茨发狂似地叫道。他的脸越发红了，他热诚慷慨起来，还天真地以为是自己造成了这些不幸。

老人听着他们的话，显然一点也不明白他们的意思，还是浑身颤抖着。

“等一等！请你喝一杯上等白兰地！”米勒看见这来路不明的客人急着要走，大声说。

他们给他拿来白兰地。老人机械地拿起酒杯，但是他的手抖得厉害，杯子还没送到嘴边，酒就撒了一半，他一滴未尝就把杯子放回盘子上。接着，他脸上现出一种怪异的、和这种场合完全不相宜的微笑，迅速地、踉踉跄跄地走出铺子，把阿佐尔卡留在原地。大家都吃惊地站着；有人在感叹：

“швернот！ вас – фюр – эйне – гешихте！”^②那些德国人睁大眼睛，

① 此处原书用的是德国人说的半通不通和发音不准确的俄语。下面有些对话同此。

② 此处系用俄文字母拼写德文，意思是：“倒霉！竟然发生了这种事！”

对视着，说。

但是我冲出门去追赶那个老人。从果点店右边走过去几步，有一条又黑又窄的巷子，它的两边都是高大的房屋。我灵机一动，断定老人一定是转进巷子里去了。巷子右边的第二座房子正在修建，周围搭着脚手架。房子周围的篱笆几乎扩展到巷子中间，紧靠篱笆的地方铺了木板，便利行人行走。在篱笆和房子形成的一个黑暗角落里，我找到了老人。他在木板人行道边上坐着，两肘支在膝盖上，两手托着头。我在他身旁坐下。

“您听我说，”我几乎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只是对他说，“不要为阿佐尔卡伤心了。来吧，我送您回家。别烦恼了。我马上去雇一辆马车。您住在哪里？”

老人没答话。我不知怎么办好。巷子里没有过往行人。他突然抓住我的胳膊。

“胸口闷！”他用沙哑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胸口闷！”

“我们到您家里去吧，”我稍稍站起来，一边拉他，一边大声说。“到家里您就可以喝点茶，躺下睡觉……我去叫一辆马车。我去请一位医生……我认识一位医生……”

我不记得我还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本想站起来，但是刚抬起身子又跌坐在地上。于是他又用同样沙哑、哽咽的声音喃喃地说着什么。我向他凑过去，想听听他在说些什么。

“在华西里耶夫岛，”老人用沙哑的声音说。“六道街。六……道……街……”

他没再说下去。

“您住在华西里耶夫岛？那您走错了。是朝左边走，不是朝右边走。我就带您去……”

老人没有动。我拉起他的手；他的手像死人的手一样掉下去了，我看他的脸，摸摸他——他死了。我觉得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梦。

这件意外的事给我招来了许多麻烦，在这期间我的热病却自己好了。老人的住所找到了。不过他不是住在华西里耶夫岛，而是住在离他死去的地方只有两步路远的克卢根大楼，他的住所在最高的第五层，那是一个独用的套房，包括一个小过道和一个又大又低的房间，有三个隙孔作为窗户。他的生活很穷苦。家具只有一桌两椅和一张很旧很旧的沙发，硬得像石头一样，四边都露出作衬垫的椴树皮来；就是这些东西，也还是属于房

东的。炉子显然好久不烧了，也没有找到蜡烛。现在我才确实想到，老人到米勒店里去，只是为了要在一间有亮光的屋子里坐坐，取取暖。桌上放着一只空的陶制带耳杯，旁边有一片又干又硬的面包皮。钱，一戈比也没有找到。甚至连一件给他穿着下葬的替换衬衫也没有；有人将自己的衬衫拿来了。显然他不可能这样孤零零地过活，肯定有人会来看望他，即使不是很经常。在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证件。老人是一个外国人，但入了俄国籍。他的名字叫杰里米·史密斯，是一个机械师，七十八岁。桌上有两本书，一本是简明地理，一本是《新约》俄译本，边上有铅笔记号和指甲划过的痕迹。这些书我自己留下了。有人向房东和别的房客查问老人的情况，房东和房客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这幢房子里有许多房客，差不多全是手艺人和德国妇女，她们出租住所，并且提供包饭和用人。房屋的总管是贵族出身，对于这个过去的房客也说不出多少情况，只说这屋子月租六卢布，死者住了四个月，但是后两月分文未付，所以不得不赶他走。也问过是否有人时常来看他，但是没有人能作出满意的答复。这是一幢大房子，到这个挪亚方舟^①里来的人有那么多，怎能记得住他们？看门人在这幢房子里已经服务了五年，他或许可以提供点情况，但他却在两个礼拜前请假回故乡去，留下他的侄子代替他的职务，他的侄子是个年轻人，房客还有一半没有见过面呢。这一切查询究竟是怎样了结的，我不很清楚，但是老人还是被送去埋葬了。在这些日子里，我虽然有许多事情要办，却还抽空到华西里耶夫岛六道街去了一次，不过到了那里，我自己也笑话自己了。除了一排普通的房子，我在六道街还能看见什么呢？但是我不懂，为什么老人在临死的时候，要提起六道街和华西里耶夫岛呢？难道他烧糊涂了吗？

我看了看史密斯空下来的住房，觉得还满意。我把它租下来了。主要是因为它很大，虽然很低，一上来我老是觉得头要碰到天花板。不过我不久就习惯了。房租六卢布一个月，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住房了。屋子是独门独户的，这一点很吸引我。我只消找一个仆人就行了，因为完全不用仆人我无法生活。看门人当时答应每天至少来一次，必要时还可以为我做点事情。我想：“谁知道呢，也许有人会来看看老人吧！”但是他死后已经五天过去了，却还没有一个人来过。

^① 挪亚方舟的故事请参阅《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五章第二十八节至第十章。它原是为避洪水之难而造的；此处用来比喻杂乱地方。

第二章

那时候，也就是一年前，我还在给几个刊物撰稿，写点文章，我坚信，我有一天会写出一部大部头的好作品。那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结果我住进了医院，看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一切也就完了。既然我就要死了，那为什么还要写回忆录呢？

我不由得连连回想起我生活中这苦楚的最后一年的前前后后。我要把它全部写下来，我要是没有找到这件工作，那我真会苦闷死的。过去的这些印象，有时使我极度苦痛，极度烦恼。这些印象一经写出来，它们就会变得稍能安慰人，稍为和谐些。它们就不会那么像一场恶梦了。这是我的感觉。光是伏案写作本身，就有很大作用：写作能使我得到安慰，能使我冷静，能使我重理文学旧业，把我的回忆和病态的梦变成事业，变成工作……是的，这个想法很好。而且，这也能留点东西给我的医士呀，在安装双层窗过冬时，他可以用我的稿子糊糊窗子。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中间开始了我的故事。假如要全部写下来，我就必须从头写起。好吧，我们就从头写起。好在我的自传是不长的。

我不是在本地出生的，而是出生在一个遥远的省份，我的父母可以说是好人，但我还在童年时他们就都去世了，我是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家里长大的，他是一个小地主，出于怜悯收留了我。他只有一个女儿娜达莎，比我小三岁。我们像兄妹般在一块儿长大。啊，我那幸福的童年！一个人活到了二十五岁还要去怀念、惋惜它，到垂死时还怀着狂喜与感激的心情一心回想它，这该是何等的愚蠢！在那些时日，天上的太阳是多么明亮，和彼得堡的太阳毫不相同，我们幼小的心是那么活泼而欢快地跳动。那时候我们的周围都是田野和树林，不像现在全是一堆堆死气沉沉的石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所管理的华西里耶夫斯科耶的花园和公园，是何等美丽啊。娜达莎和我时常到那个花园里去散步，在花园后边，有一座阴湿的大森林，我们两个孩子有一次在那里迷了路。那是一个多么幸福的黄金时代啊！生活第一次神秘而诱人地展现在我眼前，和它初次接触是多么甜蜜啊！在那些日子里，每丛灌木和每棵树木后面，似乎都有人生

活着，他们是那么神秘，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仙乡与现实融为一体了；有时深谷中凝聚着一片浓密的晚雾，像一缕缕灰白色的发辫缠绕着深谷底部石头上生长的灌木丛，这时候，娜达莎和我手携着手，又胆怯又好奇地站在深谷的边上向下面深处窥探，期待着随时会有人从谷底的雾中出现或应答我们的呼喊；那时我们的乳母所讲的童话就会变成合情合理的事了。好久以后，我偶尔向娜达莎提起，有一次我们弄到了一本儿童读物，立刻就跑到花园中的池塘旁边，在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枫树下我们喜爱的绿色长椅上坐下，开始读一篇童话——《阿尔芬索与达林达》^①。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篇故事，心里仍不免发出一阵奇异的颤动。一年前，我向娜达莎提起开头两句，“阿尔芬索，我这篇故事中的主人公，生在葡萄牙；他的父亲叫堂拉米罗，”等等，这时我几乎要哭出声来。我的样子一定非常可笑，因此娜达莎对我当时表现出来的激动心情才那么奇怪地笑了一笑。但她立刻就感到这样做不好（这一点我还记得），因而自己也谈起往事来安慰我。说着说着，她自己也激动起来了。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黄昏。我们重提了一切往事：我们谈到我被送到省城里的寄宿学校——天哪，那时她哭得多厉害呀！——我们还谈到我永远离开了华西里耶夫斯科耶，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离别。那时我已经在寄宿学校毕业，要到彼得堡去，准备上大学。当时我十七岁，她还不满十五岁。娜达莎说我当时是那么傻头傻脑，长得又细又长，谁看见我都要发笑。离别时我把她拉到一旁，想对她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我的舌头突然不听使唤，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告诉我，说我当时非常激动。自然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大概也不明白我的心意。我只是伤心地哭泣，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了。我们好久之后才在彼得堡重新见了面；那是在两年之前。老伊赫缅涅夫为了打官司来到彼得堡，我刚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第三章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出身于一个早就衰败的名门望

^① 这是一部感伤的道德教育小说，刊登在《儿童读物》一七八七年第十一十二期，译者是尼·米·卡拉姆辛。

族，但是他父母去世时却给他留下一份有一百五十个农奴的可观田产。二十岁时他进了骠骑兵团。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在军队服役的第六个年头，在一个倒霉的晚上，他赌牌把所有的财产都输光了。他彻夜未眠。第二天晚上他又去赌牌，把他仅剩的财产——一匹马拿来作赌注。他赢了钱，接着赢了第二盘，第三盘，在半个钟头之内，他赢回自己田产中的一个小村子伊赫缅涅夫卡村，根据最近一次户口调查，这个村子有五十个农奴。他戒了赌，第二天就申请退伍。他永远失去了一百个农奴。两个月后，他以中尉衔退职，动身回他的小村子去。此后他一辈子再没有提起过他赌牌输钱的事，尽管他的好脾气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谁要敢于向他提起这件事，他就准和谁吵架。在乡间，他苦心经营田产，在三十五岁上他娶了一个贵族出身的贫寒女子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舒米洛娃，她完全没有妆奁，不过她曾在一个叫蒙-雷韦什的法国侨民所办的贵族寄宿学校里受过教育，这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终生引以为自豪的，虽然那种教育里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成了一个当家的能手。邻近的地主们都来向他学习管理田产的办法。几年时间过去了，突然有一个地主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从彼得堡来到邻近一个拥有九百农奴的庄园华西里耶夫斯科耶村。他的到来使邻近一带地方大为轰动。公爵虽然不是个翩翩少年，不过还年轻，他的官衔不算低，交游广阔，殷实富有；是一个漂亮男子，而且还是个鳏夫，全县的太太小姐们对这一点特别感兴趣。人们谈论着同他有亲戚关系的省长在省城里大摆排场接待他；谈论他“由于大献殷勤”，使所有的妇女“晕头转向”，等等，等等。简单说，他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卓越代表之一，这类人难得在外省露面，一旦露面，便会引起异常的激动。不过公爵并不是个彬彬有礼的人，对于他认为用不着，以及地位稍不如他的人尤其如此。他认为无需去结识他领地周围的邻人，这立刻就给他招来了许多仇人。因此，当他突然想起去拜访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时候，大家都极吃惊。不错，尼古拉是他最近的邻居之一。公爵在伊赫缅涅夫家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立刻把他们夫妇俩迷住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对他尤其热情。不久以后，他就和他们亲如一家，每天到他们家里去，并请他们到他家作客。他说说俏皮话，讲讲奇闻逸事，弹弹他们那架破钢琴，唱唱歌。伊赫缅涅夫夫妇百思不得其解：对于这么一位心地善良而又极其亲切的男子，所有的邻人怎么能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一个骄傲自大、毫无人情味的利己主义者呢？也许公

爵真是喜欢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吧，因为他是一个单纯、坦率、无私而且高尚的人。但是不久一切便真相大白了。公爵来华西里耶夫斯科耶，是为了赶走他的管家，这管家是一个放荡的德国人，一个自命不凡的农业家，他有一头令人肃然起敬的白发，戴着眼镜，长着鹰钩鼻子；虽然有这些优点，他却毫无廉耻、肆无忌惮地盗窃公爵的财产，而更糟的是，他还将在好几个农民折磨死了。伊凡·卡尔洛维奇终于被人抓住赃，揭穿了。他很生气，大谈特谈德国人的诚实，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赶走，并且受到了点侮辱。公爵需要一个新管家，他看中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他是一个极其理想的当家人，又非常诚实，这一点是丝毫不必怀疑的。公爵似乎非常希望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自动提出要求当他的管家。但是他的希望没有实现，一天早晨，公爵自己装出一副非常友好、非常谦恭的样子提出了请求。伊赫缅涅夫一上来不答应；但是优厚的薪水吸引着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公爵加倍推诚相见，也使他仅有的一点犹豫云消雾散了。公爵达到了目的。应该说，他在识别人这方面是很有本领的。在和伊赫缅涅夫的短期交往中，他完全明白他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他懂得必须用友好诚恳的态度博取他的交情，必须赢得他的心，不然，光靠钱对他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瓦尔科夫斯基需要一个他可以撒手不管，又可以永远信任的管家，以便永远不用再回到华西里耶夫斯科耶来，他正是这样打算的。他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身上所产生的魅力是这样强烈，后者真心相信了他的友谊。在我们俄国，有些人心地极其单纯，又天真烂漫，无论人们怎样议论他们，这些人都是很可爱的，他们一喜欢上了什么人（上帝才知道为什么喜欢），就会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他，有时他们的忠诚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便是这样的人。

许多年过去了。公爵的庄园兴旺起来。华西里耶夫斯科耶的主人和管家之间的关系真可以说是水乳交融，但也没有超出纯然事务通信的关系。公爵并不干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事务，有时还给他出些点子，既精明又切合实际，常常使伊赫缅涅夫大吃一惊。显然他不仅不喜欢浪费，而且还很会赚钱呢。在华西里耶夫斯科耶之行后又过了五年光景，公爵授权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购买本省另一份拥有四百个农奴的很好的田产。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高兴极了。他关心公爵的成功，关心他取得成就和飞黄腾达的消息，仿佛公爵是他的亲兄弟。但是他真正高兴到顶点还是在公爵有一次对他表示极度信任的时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不过我觉

得有必要在这里提提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生平的几件事情，他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我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

第四章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是个鳏夫。他在刚刚成年时就结了婚，是为金钱才结婚的。从他那在莫斯科完全破了产的父母那里，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华西里耶夫斯科耶的田产一再典当出去，他负债累累。公爵二十二岁时不得不在莫斯科一个政府机关当差，他身无分文，踏进社会时是一个“望族的讨饭后裔”^①。他和包税人早过了豆蔻年华的女儿结婚，这门亲事把他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了。当然，包税人在妆奁上骗了他，但是无论如何，他用妻子的钱还是赎回了祖传的田产，并且重新站住脚跟。公爵娶来的包税人的女儿不大识字，连两个字也难连在一块，又长得丑，只有一种重要的美德：她生性善良，百依百顺。公爵竭力利用她这种美德。结婚一年之后，他就离开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的妻子，将她留在莫斯科，托付给她那个做包税人的父亲照料，自己到某省里做事去，在那里他靠一个有权势的彼得堡亲戚帮忙，谋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一心只想显露头角，升官晋级，干一番事业，他觉得不能在彼得堡或莫斯科和他妻子一起过下去，就决定在外省开始他的事业，等待较好的时机。据说他在结婚的第一年就粗暴对待他的妻子，几乎把她折磨死。这种流言时常使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很生气，他激昂慷慨地为公爵辩护，说他不会做出这种卑劣的事。但是七年后公爵夫人死了，丧偶的丈夫立刻就回到彼得堡。在彼得堡他确实有点引人注目。他有财产，年轻英俊，有许多出色的品质、无可否认的机智，谈吐风趣，并且总是乐呵呵的，他来到彼得堡，并不是为了寻求荣华富贵，或者找个什么门路，而是显得颇有独立的地位。据说他确实有点吸引人的东西，具有一种能征服人的力量，又有势力。他极能讨取妇女的欢心，他和一位交际花勾勾搭搭，这使他臭名远扬。虽然他生来节俭，几乎达到精打细

^①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公爵小姐》。这首诗一八五六年首先在《现代人》杂志第四期发表。